

論戴震之師承問題

陳勝長

香港中文大學

戴震(東原, 1724-1777)嘗師事江永(慎修, 1681-1762), 清人殆無異辭。其事戴震晚年頗諱言之, 張穆(石州, 1805-1849)於《方牧夫先生壽序》中云:

徽州山盤水交, 實產魁儒。本朝婺源江氏, 始以樸學為後進倡。一時從游, 卓然深造有稱於世者三人: 曰東原戴氏, 曰繁齋金氏, 其一則晞原方先生也。繁齋撰述未竟而歿。東原抗心自大, 晚頗諱言其師。而晞原先生終已命為江氏之徒無異詞。¹

其後學者論戴校《水經注》勦襲趙一清書, 而偽託出《永樂大典》本, 鄙其為人, 更彰其晚年背師之惡。如魏源(默深, 1794-1857)於《書趙校〈水經注〉後》云:

戴為婺源江永門人, 凡六書、三禮、九數之學, 無一不受諸江氏, 有同門方晞所作《羣經補義序》稱曰「同門戴震」可證。及戴名既盛, 凡己書中稱引師說, 但稱為「同里老儒江慎修」, 而不稱師說, 亦不稱先生, 則攘他氏之書, 猶其事之小者也。²

王國維(靜安, 1877-1927)於《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則云:

東原學問才力, 固自橫絕一世, 然自視過高, 驚名亦甚。……其平生學術出於江慎修。……其於江氏亦未嘗篤在三之誼, 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³

1 《勇齋文集》, 咸豐八年(1858)壽陽祁氏刻本, 卷二, 頁十七上至十七下。

2 《魏源集》, 北京: 中華書局, 1976年3月, 頁226。

3 《觀堂集林》, 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9月影印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王國維遺書》, 卷十二, 頁三十三下。

江、戴關係，為清代學術史上一大公案。輒近為戴震辯誣者多為徽人。歙縣許承堯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序《安徽叢書》第六期《戴東原先生全集》，始則曰「承堯以為先生之學，深造自得，不由師授。」⁴繼則辨江、戴關係，以為「誼在師友之間，原未嘗著籍稱弟子。」⁵其言曰：

靜安又謂先生之學出於江慎修，其於江氏未嘗篤在三之誼，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按《行狀》云：「先生自江寧歸，淳安方蔡如先生掌教紫陽書院，一見先生文，深折服。時郡守何公，嘗以月某日，延郡之名人宿學，講論經義於書院之懷古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博綜淹貫，先生一見傾心。取所學就正。江先生見其盛年博學，相得甚歡。一日，舉曆算中數事為問，先生為比較剖析，言其所以然，江驚歎其敏。」考何達善守徽在乾隆己巳(1749)，先生年二十七，明年庚午(1750)，方蔡如應聘主講紫陽，定新安三子課藝。三子者先生與鄭牧、汪梧鳳也。又二年壬申(1752)夏，程讓堂姊婿汪松岑言於其從祖之弟在湘，在湘因延先生至其家教其子。在湘，梧鳳字，歙之西溪人。家有園名不疏，園多藏書。其《松溪文集·送劉大樞序》云：「余生二十五年，從游淳安方朴山先生，後三年，從游星源江慎齋先生。」梧鳳生雍正丙午(1726)，少先生三歲。其從方蔡如年二十五，正在庚午。而後三年從江慎修，則在癸酉(1753)。汪容甫為梧鳳墓志云：「江、戴二人孤介少合，君獨禮而致諸其家。」是江亦館汪氏。先生與江蹤跡之密，殆無逾於此時。又二年乙亥(1755)，先生入都。(原注：王昶撰先生墓志銘作甲戌之春，此從段玉裁《年譜》。)後七年壬午(1762)，江卒於家，先生撰《事略狀》，上之續文獻通考館、史館。蓋江氏之學得先生而後表章，而先生與江自庚午相見至乙亥，不過五年。誼在師友之間，原未嘗著籍稱弟子。然先生書中於江多稱吾齋先生，且先生本亦字慎修，後遂不用，其尊之者至矣，靜安所云，亦未諦也。⁶

按許承堯考證戴震於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始識江永，與段玉裁(若膺，1735-1815)所為《戴東原先生年譜》繫之乾隆七年壬戌(1742)者不同。其實在許氏之前魏建功已於所為《戴東原年譜》⁷發之矣。惟魏《譜》則云戴震「見江慎修而師之」⁸，與許所強調戴震之學「不由師授」、與江永「誼在師友之間」者為異。魏之言如此，以魏《譜》嘗採用王昶《江慎修先生墓志銘》之材料，故知戴震之於江永嘗「著籍稱弟子」也(說詳後)。

續溪胡適之為戴震辯誣也，1943年作《戴震對江永的始終敬禮》一文，中云：

4 《安徽叢書》第六期，民國二十五年(1936)《安徽叢書》編印處刊本，許《序》，頁一上。

5 同上注，頁三下。

6 同上注，頁二下至三下。

7 魏建功《戴東原年譜》，《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一號，民國十四年(1925)12月，頁125-153。

8 同上注，頁147。

我曾遍查孔刻本《戴氏遺書》，只見東原一生對於江慎修真是處處盡敬禮，從沒有一點不恭敬的態度，也沒有一句不恭敬的話。

東原著作中，提到江慎修之處，有這些！

- (1) 考工記圖提到三次，都稱「江先生曰」，（頁三二，三六，四四），又附註云：「江先生名永，字慎修，著律呂新義」。（頁四五）此書作於乾隆丙寅（十一年，一七四六），東原二十四歲。刻書時在乾隆乙亥（二十年，一七五五），他三十三歲，已負盛名了。
- (2) 顧氏音論跋稱「江先生」一次。（段刻本作江丈。）此文作於乾隆癸未（二十八年，一七六三），東原四十一歲。
- (3) 荅段若膺論韻稱「江慎修先生」一次，以下稱「江先生」凡八次。此書作於乾隆丙申（四十一年，一七七六），那時東原五十四歲，次年他就死了。

東原二十歲始從江慎修問學。我們看他從二十四歲到五十四歲，從少年到他臨死，提到慎修，都稱「江先生」。……只有兩次敘述古音的歷史，說鄭庠顧炎武江永三個人的古韻分部，因為作歷史的記載，特別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的稱呼。一處是聲韻攷卷三的「古音」一卷，……一處是他給段玉裁做的六書音均表序。……讀這兩段歷史敘述，請問這一句「吾郡老儒江慎修永」有一絲一毫不恭敬的意義嗎？於亭林則直稱「崑山顧炎武」，於慎修則特別尊稱為「吾郡老儒江慎修永」，這不是特別表示敬意嗎？「吾郡老儒」豈不是等於說「吾郡的一位老先生」嗎？⁹

許、胡篤恭鄉里，雖有足多，惟胡氏以「吾郡老儒」等於說「吾郡的一位老先生」，文不稱師，胡氏尚企圖為「背師盜名」者平反，實在並不高明。至若許氏之罔顧有關史料，遽謂戴震之學不出江永，二人誼在師友之間，則亦曲護鄉賢之蔽也。

余英時先生撰《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兼論戴震與江永的關係》一文¹⁰，則仍據許承堯之言，以為「江、戴初晤在庚午不在壬戌，其讞可以定。」¹¹又謂「現存第一手史料皆不言東原為慎修弟子……遍檢東原生前相知所為傳記，固無一人曾謂江、戴有正式師弟關係。」¹²因謂江戴師生之說乃屬後起，戴震於江永既未嘗正式執弟子禮，「則自無所謂背

9 見《胡適手稿》第一集，台北：胡適紀念館，1966年2月，卷一，頁29-30。

10 余英時《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兼論戴震與江永的關係》，原載《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民國六十三年（1974），頁29-64，其後收入所著《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香港：龍門書店，1976年9月，頁151-183。

11 同上注，《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頁45；《論戴震與章學誠》，頁167。

12 同上注，《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頁47；《論戴震與章學誠》，頁168、169。

師問題」¹³。至論戴震晚年稱江永為「吾郡老儒江慎修永」，有別於早年於《經考》中稱「江沅（慎）齋先生」者，余先生則以為「恐亦與東原對『道』之新體認有關」¹⁴，意謂戴震晚年成《孟子字義疏證》，治義理之學深造有得，遂降考據為第二義之學，就戴氏晚期之見解言之，「慎修之學已不足以言『聞道』矣。」¹⁵余先生所論，竊以為尚可商榷。日月逾邁，未聞有繼余先生此文詳辨江、戴關係者¹⁶。是故不揣固陋，敢陳一得之見。倘余先生文中別有微意深旨，則非末學之所知。識小之譏，或不免焉。

二

考清人論江、戴關係之第一手材料，今可見者，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戴震所為《江慎修先生事略狀》而外，以後此十餘年王昶（德甫，1725–1806）之《江慎修先生墓志銘》最為重要，文見《春融堂集》卷五十五，其言曰：

余友休寧戴君東原，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常自述其學術實本之江慎修先生。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先生卒。是年東原舉于鄉。明年來京師，求所以志先生者。卒卒不果。又十餘年，余自蜀還朝，而東原以薦授庶吉士，校理四庫館書，於是取所自為《狀》及汪世重等《年譜》而屬余銘之。……先生弟子著籍者甚衆，而戴君及金君榜尤得其傳。¹⁷

可知王昶之志江永，實據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與汪世重等所為《江慎修先生年譜》為之，且其事出戴震之請也。汪世重等所為《年譜》未見¹⁸，而戴震《事略狀》中固未嘗言師事江永，王昶《江慎修先生墓志銘》中稱江永弟子之著籍者戴震尤得其傳，其或本之汪世重等所為《年譜》歟？考王昶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還朝¹⁹，則此《墓志銘》當成於丙申、丁酉（1777）間而為戴震所及見者也。

13 同上注，《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頁48；《論戴震與章學誠》，頁170。

14 同上注，《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頁56；《論戴震與章學誠》，頁178。

15 同上注。又余先生文中論戴震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以後治義理之學之經過，見《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頁54–55；其後作《戴東原與清代考證學風》（收入《論戴震與章學誠》，頁83–132），論述尤詳。

16 徐復觀曾於《「清代漢學」衡論》一文（原載《大陸雜誌》，第五十四卷第四期，民國六十六年[1977]4月15日，頁1–22；其後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一年[1982]3月27日，頁511–567。）引用盧文弨之言，以證明戴震入京之初對其師江永仍很推崇。未知是否針對余先生之文而發。

17 《春融堂集》，清光緒十八年（1892）重刊本，卷五十五，頁三下、五下。

18 按楊殿珣《中國歷代年譜總錄》「江永」條下著錄：「《江慎修先生年譜》一卷，清·江錦波、汪世重合編，《放生戒殺現報錄》附刊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0年11月，頁245）此書未見。

19 參《春融堂集》所附嚴榮《述庵先生年譜》。

戴震之於江永，嘗著籍稱弟子，已如上述。且戴震於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入都以後，嘗對人盛稱其師江永之學矣。盧文弨(紹弓，1717-1796)有《江慎修〈河洛精蘊〉序》一文，中謂：

吾友戴東原在京師，嘗爲余道其師江慎修先生之學，而歎其深博無涯涘也。²⁰

文題下注「乙巳」二字，蓋即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去戴震之死未遠。合王、盧之文觀之，安得謂戴震師事江永之說後出耶！

又考錢大昕(曉徵，1728-1804)《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載《與戴東原書》一通，中云：

前遇足下於曉嵐所，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在宣城下。僕惟足下之言是信，恨不即得其書讀之。頃下榻味經先生邸，始得盡觀所謂翼梅者。其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邏巴之說，而引而伸之。其意頗不滿於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識之高，何也？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及觀其冬至權度，益啞然失笑。……向聞循齋總憲不喜江說，疑其有意抑之。今讀其書，乃知循齋能承家學，識見非江所及。當今學通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獨推江無異辭，豈少習於江，而特爲之延譽耶？²¹

可知戴震亦嘗對錢大昕稱江永推步之學矣。顧錢氏則以爲江永不及宣城梅文鼎(定九，1633-1721)，文鼎之孫穀成(循齋)能承家學，識見在江永上。頗訝戴震之延譽江永特甚。此書錢氏自編《年譜》注繫之乾隆十九年甲戌²²，觀書中之言，則戴震或已移寓紀昀(曉嵐，1724-1805)家，似應繫之乙亥(1755)²³。又據書中「向聞循齋總憲不喜江說」之言，則錢大昕耳江永之名，尚在戴震入都之前也。

戴震入都翌年乙亥，紀昀爲刻《考工記圖》，且爲之序曰：

戴君東原始爲《考工記》作圖也，圖後附以己說而無注。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戴君乃爲余刪取先後鄭注，而自定其說以爲補注。又越半載，書成。仍名曰《考工記圖》，從其始也。戴君語余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歎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矣。」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爲漢已降儒者所不能及。²⁴

20 《抱經堂文集》，《四部叢刊》影印閩縣李氏觀樞齋藏嘉慶本，卷六，頁五下至六上。

21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國學基本叢書》本，上海：商務印書館，頁518-520。

22 錢大昕《錢辛楣先生年譜》，《十駕齋養新錄》卷首附，《國學基本叢書》本，上海：商務印書館，頁22。

23 按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乾隆二十年乙亥下引程易田云：「是年假館紀尚書家。」（見《戴震集》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月，頁459）又紀昀《考工記圖·序》曰：「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戴震集》附錄，頁460）

24 《安徽叢書》所收影印河間紀氏閱微草堂本《考工記圖》，紀《序》，頁一上。

細讀此序，當知「自定其說以爲補注」者，即《考工記圖》未加注前圖後所附之「己說」耳。此等文字與最初成書時應無大出入。按《考工記圖》後序云：「豈（時）柔兆攝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間，東原氏書於游藝塾。」²⁵可知最初成書蓋在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據胡適考證，《考工記圖》稱「江先生曰」者凡三次，今檢江氏所著書，知其中兩次實出《周禮疑義舉要》（另一次出《律呂新義》，原附注已言之。）論者或以爲乃乙亥付刻前所增入²⁶，雖或有此可能，似難確考，姑置不論。不過胡適所考證者尚有遺漏。按《考工記圖》卷下有圖曰「爲規識景」²⁷，題下注云：「此圖得之江先生」。然則此圖決非戴震入都以後所加者殆可斷言。即此一端，已可證明戴震於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之前已交江永矣。魏建功、許承堯等人據洪榜（汝登，1745-1779）《行狀》推斷江、戴初識在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自亦無法成立。

紀昀於《考工記圖·序》中引戴震言「先師程中允」云云，其人蓋即程恂，竊以爲於江、戴二人相交關係甚大。按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云：

先生（按指江永）嘗一遊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至也。三禮館總裁桐城方侍郎苞素負其學，及聞先生，願得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而荆溪吳編修紱自其少於禮儀功深，及交於先生，質以《周禮》中疑義，先生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一書，此乾隆庚申（1740）、辛酉（1741）間也。

後數年，程、吳諸君子已歿，先生家居寂然。值上方崇獎實學，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時婺源縣知縣陳公，有子在朝爲貴官，欲爲先生進其書，來起先生。先生自顧頹然就老，謂無復可用；又昔至京師，所與遊皆無在者，愈益感愴，乃辭謝。而與戴震書曰：「馳逐名場非素心。」卒不能強起。²⁸

而洪榜《戴先生行狀》則云：

先生（按指戴震）之自邵武歸也，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大愛重之，曰：「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碩輔，誠不足言。」²⁹

據《行狀》之言，戴震自邵武歸休寧當在乾隆七年壬戌（1742），年甫二十，而程洵（案當依戴震《事略狀》作恂）一見即大加愛重，其後復向齊召南（次風）推延戴震所爲《考工記圖》。戴震

25 同上注，卷下，頁六十五下。

26 參余英時《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頁46；《論戴震與章學誠》，頁168。按《考工記圖上》頁四十四下引江先生曰之文見於補注，則初成書時或已有之。

27 《考工記圖》，卷下，頁三十二上。

28 《安徽叢書》本《戴東原集》，卷十二，頁五上至五下。

29 見《二洪遺稿》之《初堂遺藁》，清道光中梅華書院刊本；又《安徽叢書》本《戴東原先生年譜》後亦附載此文。

有感程氏知遇之深，故於入都之初稱程氏曰「先師」也。今按李富孫《鶴徵後錄》記乾隆元年丙辰(1736)舉博學鴻詞者，程恂與齊召南同列二等，《錄》云：

程恂，字標也，江南休寧人。雍正甲辰(1724)進士，原任北運河同知，由兵部尚書直隸總督李衛薦舉，授檢討，陞中允。(原注：先生精于三禮，在都時嘗延江先生慎修于邸舍，互相討論，學益深博，入詞垣。充大清會典三禮館纂修官，與李少宗伯清植同珉《儀禮》之誤，極爲研審。)³⁰

婺源、休寧同屬徽州府，程恂推譽鄉賢，乃於乾隆庚申、辛酉間延婺源江永至京師。壬戌居鄉，諒必與江永同返。戴震休寧人，於程恂鄉誼尤深。程既激賞戴震，安有不向江永延譽之理？段玉裁以爲戴震初識江永在乾隆七年壬戌者，或非出於誤讀洪榜《行狀》而別有所據歟？³¹

江永長戴震四十三歲，學優一郡，乾隆庚申、辛酉間已略顯名於時，始則見賞於顯宦程恂，其後郡守何達善亦深禮重。戴震對江永執弟子禮，此理所當然者也。矧以程恂之學視江永爲何如哉？戴震猶且師之。戴之師程也，上非關鄉會試，下不能與投拜相論。後此者未聞戴震顯程之事於傳狀，顯程之書備儲四庫館。以程比江，程則進士，舉博學鴻詞；江不免爲諸生老鄉曲。然江所著書入四庫館者不下十餘種，敘錄譽之特甚，或出戴震之手³²。而今之論者

30 《鶴徵後錄》，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吳江沈氏世楷堂刊《昭代叢書》壬集補編本，卷二十四，頁十七下。

31 洪榜事蹟見江藩《漢學師承記》卷六(上海書店版[與《宋學淵源記》同本]，1983年12月，頁99-103)。榜歙縣人，卒年僅三十五歲，於戴震早年事蹟，不過得之傳聞。即或出於戴震之口，而戴震晚年諱言其師，所言或與初入都時語錢、盧諸人者異，亦不足怪。

32 按江永所著書收入《四庫全書》者計有：

- | | |
|-----------------|------------------|
| (1)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 | (9) 《鄉黨圖考》十卷； |
| (2) 《儀禮釋宮增注》一卷； | (10) 《律呂新論》二卷； |
| (3)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 | (11) 《律呂闡微》十卷； |
| (4) 《深衣考誤》一卷； | (12) 《古韻標準》四卷； |
| (5) 《禮書綱目》八十五卷； | (13) 《四聲切韻表》一卷； |
| (6) 《儀禮釋例》一卷； | (14) 《考訂朱子世家》一卷； |
| (7)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 | (15) 《近思錄集註》十四卷； |
| (8) 《羣經補義》五卷； | (16) 《算學》八卷，續一卷。 |

《四庫提要》盛稱江永之書考證精密，持義多允，勝於前人。雖有未洽，亦多爲之迴護，如於《儀禮釋例》下云：「蓋永考證本精，而此則草創之本耳。」(《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6月影印浙江杭州本，頁191)《鄉黨圖考》下云：「然全書數十百條，其偶爾疎漏者不過此類，亦可謂遠於三禮者矣。」(頁307)江永服膺朱子之學，提要於此亦無惡評，如《禮書綱目》下云：「其書雖仿《儀禮經傳通解》之例，而參攷羣經，洞釋條理，實多能補所未及，……蓋《通解》朱子未成之書，不免小有出入。……永引據諸書，釐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視胡文炳輩務博篤信朱子之名，不問其已定之說未定之說，無不曲爲袒護者，識趣相去遠矣。」(頁179)又如《近思錄集註》下云：「永遠於經學，究心古義，穿穴於典籍者深，雖以餘力爲此書，亦具有體例，與空談尊朱子者異也。」(頁781)

乃謂戴震未嘗對江永正式執弟子禮者，何哉？乾隆十六年辛未，戴震年二十九，始補縣學生，而所著書若《考工記圖》、若《爾雅文字考》者，已成卷帙³³，可謂窮陋而篤於學矣。既入四庫館，位望遂隆，晚乃諱言師事江永。劉殿爵教授蓋嘗論戴震眼光勢利、攀附名人矣，其言曰：

在《戴東原集》卷三載有《與王內翰鳳喈書》，其中說：「承示《書·堯典》注……昨僕偶舉篇首光字……則請終其說以明例」，好像他曾與王氏通信論學。但王鳴盛（鳳喈）《蛾術篇》卷四有「光被」條云：「新安戴吉士震，號為精于經。乙亥歲，予官京師，作《尚書後案》，吉士偶過予，為予論《堯典》『光被四表』，光當作橫，予未敢信。吉士沒，其文集出，內有與予札云：（中略）……三十餘年前，予雖與吉士往還，曾未出鄙著相質，吉士從未以札見投，突見于其集。昔樂安李象自刻集，內有詭稱顧亭林與之書論地理，象先答書辨顧說為非，亭林呼為『譎觚』。今吉士札譎否不足辨……」對戴氏之「詭稱」，鄙夷之色，溢於言表。則戴氏之為人亦可概見矣。³⁴

戴震之初入都，或則向紀昀稱其書嘗見賞於齊召南，或則偽造與王鳴盛論學書信，以示交厚，乃至稱其師江永之學，皆所以為顯名耳。錢大昕與戴震為學問交，深重其學。然於其為人，似亦未嘗許可也。觀《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江先生永傳》云：

休寧戴震，少不譽於鄉曲，先生（按指江永）獨重之，引為忘年交，震之學得諸先生為多。³⁵

同卷《戴先生震傳》則云：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寧人。少從婺源江慎修游。……（戴震）又嘗與友人書云：「僕數十年來，得於行事者，立身則曰不苟，待人則曰無憾。事事不苟，猶未能遠恥辱也。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也。其得於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揆擊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講明正道，修辭立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所不計也。」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餽粥幾不繼，人皆目為狂生。一日，攜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既去，予目送之，歎曰：「天下奇才也。」³⁶

33 關於《爾雅文字考》成書年代，參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十四年己巳，二十七歲」條下。（《戴震集》附錄，頁458）

34 見《學術與人格》，《明報月刊》，第十二卷第二期（總第134期），1977年2月，頁63。

35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頁616。

36 同上注，頁619-620。

據錢氏自編《年譜》，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年四十三歲，「始讀《說文》，研究聲音文字訓詁之原。」³⁷其為受戴震之影響，自不待言。錢氏固知戴震少習於江永，而戴震所為《聲韻考》，竟稱其師曰「吾郡老儒江慎修永」，錢氏能無所感乎？聽言觀行，夫子所以寄慨！《戴震傳》中於「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之前詳引戴氏與友人書者，殆亦有深意歟？牟潤孫先生嘗為文闡發錢大昕《潛研堂文集》與《十駕齋養新錄》中之論政微言³⁸，竊以為錢氏史學大家，《潛研堂文集》篇章次第，或恐亦有微意深旨³⁹。今按《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始載平生與友人書信。第一通題為《與友人論師書》，次則為《與戴東原書》，次則為《與段若膺書》。段於戴稱弟子，終生尊戴不渝。《與戴東原書》前文已加徵引，蓋錢氏與戴震論其師江永推步之學者也。顧卷三十三各通書信，皆論學術，獨卷首一通不然，今摘錄《與友人論師書》如下：

日者，足下枉過僕。僕以事他出，未得見。頃遇某舍人云：足下欲以僕為師。僕弗敢聞也。蓋師道之廢久矣。古之所謂師者，曰經師，曰人師。今人所謂師者，曰童子之師，曰鄉會試之師，曰投拜之師。……童子之師，猶巫醫百工之師，稱之曰師，可也。鄉會試主司同考之于七子，朝廷未嘗許其為師，而相沿師之者三百餘年。然令甲又有外官官小者迴避之例，則固明予以師之稱矣。漢人於舉主有為之制服者，而門生之名，唐宋以來有之。語其輩行，則先達也；語其交誼，則知己也。因其一日之知，而奉之以先生長者之號，稱之曰師，亦可也。今之最無謂者，其投拜之師乎？外雅而內俗，名公而實私。師之所求于弟子者，利也。傳道解惑無有也。束脩之間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藉于師者，勢也。質疑問難無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師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古之好為師也以名，今之好為人師也以利。好名之心，僕少時不免，迄今方以為戒；而惟利是視，則僕弗敢出也。⁴⁰

據「好名之心，僕少時不免，迄今方以為戒」諸語，知此書當作於中年或晚年。其次之《與戴東原書》則作於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或二十年乙亥(1755)，已見前論，時錢大昕不過二十七、八歲。然則以《與友人論師書》廁於《與戴東原書》之前者，論其時既不相接，表面上內容亦不相侔，豈謂史學大家如錢氏者詮次其文雜亂若此乎？昔者司馬遷以屈原、賈生合傳，所以明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者，異代而同悲；以《司馬相如列傳》廁於《西南夷列傳》之後，則《子虛》、《大人》，靡麗多誇，要歸風諫，而功烈尤關唐蒙之通夜郎。是乃史家之微意也。反

37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頁32。

38 見牟著《錢大昕著述中論政微言》，《明報月刊》，第十六卷第十二期(總第197期)，1981年12月，頁85-88；第十七卷第一期(總第198期)，1982年1月，頁88-92。

39 按段玉裁《潛研堂文集·序》云：「集凡五十卷，分為十四類者，先生所手定也。」(《潛研堂文集》，段《序》，頁2)

40 《潛研堂文集》，頁517-518。

觀錢集，卷三十三首論師道，次錄與戴震書，書末云：「當今學通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獨推江無異辭，豈少習于江，而特為之延譽耶？」然則所以首論師道者，寧非為戴震晚年諱言其師下一註脚乎？

三

戴震於書中稱引江永之言，除胡適所舉者外，尚見於《經考》與《經考附錄》，皆作「江沓齋先生曰」⁴¹，所引之言，見於《經考》者凡四次，《經考附錄》者一次。《經考附錄》晚出，來源可疑，恐出偽託⁴²。至於《經考》中稱引江說，計卷一「卦變」條下一次⁴³，蓋出江永《河洛精蘊》卷五「卦變說」，而文字頗有刪節⁴⁴；另《經考》卷三「古音叶韻」條下三次⁴⁵，皆出江永《古

41 按門弟子或稱江永曰「江沓齋先生」，沓即慎之古字，如汪梧鳳為文稱「從游星源江慎齋先生」（見本文引許承堯《戴東原先生全集·序》所引《送劉大魁序》）。又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許作屏《周禮疑義舉要·序》云：「辛亥遊新安，始備觀沓齋江先生書。」（《叢書集成》本，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1936]12月，許《序》，頁1）然則沓（慎）齋或即江水之號歟？許作屏私淑於江水，序中亦稱戴震為江水高弟也。

42 按《安徽叢書》所收《經考》五卷，乃據南陵徐氏《鄮齋叢書》本。此書原委，據李文藻跋，知是從河間紀先生（昀）借錄而經餘姚邵二雲手校者。至於《經考附錄》七卷，實據歙縣許承堯所藏寫本影印。許氏跋云：承堯得此書時共三冊，二巨冊為《經考附錄》，一為先生（按指戴震）所撰《屈賦注》之首冊。皆乾隆時寫本，皆湖田草堂舊藏，皆有墨印匡格，其匡格之尺寸大小亦同。《屈賦注》只有不疏園刊板，微波榭未重刊，見《年譜》。此首冊前無盧學士序，寫極精工，當為不疏園初寫本無疑。則此《附錄》二冊亦出不疏園同時寫本無疑矣。湖田草堂藏書皆咸豐亂後得之，其由不疏園流轉而出，揣之近理。（頁一下至二上）

據此知《安徽叢書》所收《經考附錄》與《屈原賦注初稿》乃同一來源。除湖田草堂印外，別無題跋。《經考附錄》各卷之首不著戴震之名，書中稱江沓齋先生者一次。（見卷一「大衍」條下[頁十九下]，蓋亦出《河洛精蘊》者）又「膺孔安國書傳」條按語稱「錢編修曉徵嘗與予論及此」（卷二，頁七十五下），則戴震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入都後事也。至於《經考》於「大戴禮記八十五篇」條按語錄乾隆丁丑所為《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卷四，頁十七上至十八下），其事猶在甲戌之後。紀、邵等人既得見《經考》，何以戴震不並出《經考附錄》與之傳鈔，此事之可疑者也。許承堯以為《屈原賦注初稿》為不疏園初寫本，《經考附錄》亦為同時寫本無疑，則此《經考附錄》寫本不當記入都以後事矣。據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知戴震所為《屈原賦注》成於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戴震集》附錄，頁458），刻成則在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頁463），注中嘗引紀編脩曉嵐之言，殆出後加，此所謂《屈原賦注初稿》者則無之，惟注文與刻本多有不同，如「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下注云：「後人名字說，蓋昉于此。」（卷一，頁一下）竊以為戴震少作亦不至鄙陋若此也。而「退將復脩吾初服」後注云：「此二章即淵明歸田園之意，所謂『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是也。蘭皋椒丘，即舊林故淵之義。」（卷一，頁九上）以後證前，豈識見如戴震者所當有！即此而論，已可斷其出於偽作。作偽者蓋效《孟子》偽孫奭《疏》故智，《屈原賦注》別有《通釋》、《音義》，此則散《音義》入正文下，散《通釋》入注中，既採刻本之注，復雜以偽說，託名戴震，以售其鄙陋之見耳。《經考附錄》與《屈原賦注初稿》同一來源，其作偽之迹，或同出一手歟？敢先陳梗概於此，他日當為文詳辨之。

43 《經考》，卷一，頁十三上至十六上。

44 《河洛精蘊》，上海千頃堂書局民國十四年（1925）印本，卷五，頁一上至十上。

45 《經考》，卷三，頁二十一上至二十二下。

韻標準》⁴⁶。今考余英時先生以爲《經考》一書至少己巳、庚午已成卷帙，其中一條主要論據爲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余先生云：

然考之《舜山是仲明先生年譜》，此書（按指《與是仲明論學書》）殆作於己巳（1749）或庚午（1750），而《經考》草創則猶在其前。故東原與是仲明書開首便說：

僕所爲《經考》，未嘗敢以聞於人，恐聞之而驚顧狂惑者衆。

這裏《經考》兩字是書名，並非經學考證的泛稱。與是仲明書有下面一段有名的說法：

僕聞事於經學，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三者，僕誠不足與於其間，其私自持，暨爲書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博聞強識，如鄭漁仲、楊用修諸君子，著書滿家，淹博有之，精審未也。

今查此說全本之《經考》。《經考》云：

宋吳棫才老始作《韻補》……明楊慎用修又增益之……余謂凡著述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二家淹博有之，識斷、精審則未也。

可見三難之論東原已先於《經考》中發之；及寫「與是仲明書」時，不過易吳才老之例爲鄭漁仲而已。⁴⁷

按余先生論《經考》之草創猶在《與是仲明論學書》之前則是矣⁴⁸。至謂三難之論東原先於《經考》中發之則非也。三難之論雖見《經考》卷三，其實乃引「江沅齋先生」之言而見於《古韻標準·例言》者也。江永作《古韻標準》，戴震嘗與參定⁴⁹，據此可知戴震爲《經考》時，已在參

46 其一見《古韻標準·例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12月影印清咸豐元年[1851]沔陽陸建瀛覆刻《貸園叢書》本，頁二上至二下[總頁3]），中間略有刪節；其二見平聲第一部「同」字下（卷一，頁一上至一下[總頁13]）；其三見平聲第十三部「嚴」字下（同卷，頁六十九上至六十九下[總頁47]）。

47 《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頁32；《論戴震與章學誠》，頁153-154。

48 按余先生據《是仲明先生年譜》定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作於己巳或庚午。其實本之錢賓四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1937]5月）之考證。惟錢先生僅謂「相其語氣，疑是己巳庚午兩年是、戴相晤於徽州時事也。」（頁312）蓋錢先生以爲段玉裁爲《戴東原年譜》，年已八十，頗有誤憶誤排。又謂「段編戴集與是書題注癸酉，亦與年譜違異，可證年譜不足盡據。」（同上頁）最後乃謂「與是書雖不能確定其年月，謂在癸酉東原未入都前，諒無大誤。」（頁313）癸酉即乾隆十八年（1753）。余先生以爲戴震草創《經考》在識江永之前，故不以《與是仲明論學書》繫之癸酉也。

49 按《古韻標準·例言》云：「余（按指江永）既爲《四聲切韻表》，細區今韻，歸之字母音等。復與同志戴震東原商定《古韻標準》四卷，《詩韻舉例》一卷，於韻學不無小補焉。」（頁一下至二上）今所見《古韻標準》卷首，各本均有「休寧戴震東原參定」字樣。

定《古韻標準》之後矣。《古韻標準》成書之確實日期，今難確考⁵⁰，所可知者，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襲取江永三難之論，則其時《古韻標準》或未刊行歟！

善乎余先生之言曰：「東原早年之於慎修，凡弟子之所當禮於其師者，胥一一為之。」⁵¹戴震既於江永著籍稱弟子矣，則晚年稱之為「吾郡老儒江慎修永」者，非背師而何！

戴震入都之初，盛稱其師江永之學，前文已論之矣。王昶《江慎修先生墓志銘》云：

乾隆二十八年，命秦文恭公蕙田修《音韻述微》，公奏先生精韻學。詔取《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進呈，以備採擇。公又自取《推步法解》入于《五禮通考》。至戴君總校四庫書，乃盡取先生二十種寫之，以藏秘府。先生弟子著籍者甚衆，而戴君及金君榜尤得其傳。

自朱子起婺源，其後如李燔、陳淳之輩，咸以道學通經名後世。越五百餘年而先生復出，雖終老跽伏，不見知于世。而其言深博無涯涘，昭晰羣疑，發揮鉅典，探聖賢之秘，以參天地人之奧。厥後戴君諸人繼之，其道益大以光。先生歿，大興朱學士筠督學安徽，以先生從祀朱子于紫陽書院，天下以為公。⁵²

竊以為成大學問者，不一定有高尚之人格。戴震晚年成《孟子字義疏證》，欲奪朱子之席，若江永者，則配祠朱子者也。戴震諱言其師，或出不得已而為之。《國語》有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⁵³戴震稱江永曰「吾郡老儒江慎修永」，王國維譏之，以為不篤「在三之誼」，持論至公至確。至若清人之排擊戴氏，章學誠（實齋，1738-1801）實為之先。《文史通義》有《朱陸》一篇，蓋為戴震而作，其後又成《書朱陸篇後》，始顯言之，其言曰：

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鉅儒，而心術未醇，頗為近日學者之患，故余作《朱陸》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餘年，同時有橫肆罵詈者，固不足為戴君累；而尊奉太過，至有稱謂孟子後之一人，則亦不免為戴所愚。身後恩怨俱平，理宜公論出矣；而至今無人能定戴氏品者，則知德者鮮也。……余嘗遇戴君於寧波道署，……戴君則故為高論，出入天淵，使人不可測識。人詢班、馬二史優劣，則全襲鄭樵譏班之言，以謂己

50 按王昶《江慎修先生墓志銘》謂江永「七十九歲成《古韻標準》六卷……八十歲成《周禮疑義舉要》六卷。」（《春融堂集》，卷五十五，頁四上）考江永卒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年八十二。七十九歲即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八十歲即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惟戴震《考工記圖》於乾隆二十年乙亥刻出，注中已引江永《周禮疑義舉要》矣。王昶《墓志銘》所記，或據最後定本言耳。然則戴震參定《古韻標準》，恐亦甲戌入都以前事也。

51 《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頁51；《論戴震與章學誠》，頁173。余先生之言，蓋指戴震亦字慎修，與江永同，卒棄不用。

52 《春融堂集》，卷五十五，頁五下。

53 《國語·晉語一》，《國學基本叢書》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卷七，頁89。

之創見。又有請學古文辭者，則曰：「古文可以無學而能。余平生不解古文辭，後忽欲爲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覆思之，忘寢食者數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爲文者，振筆而書，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遠出《左》、《國》、《史》、《漢》之上。」……蓋其意初不過聞大興朱先生輩論爲文辭不可有意求工，而實未嘗其甘苦。又覺朱先生言平淡無奇，遂恢怪出之，冀聳人聽，而不知妄誕至此，則由自欺而至於欺人，心已忍矣。然未得罪於名教也。

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顧以訓詁名義，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醜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傲倖爲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此則謬妄甚矣。戴君筆於書者，其於朱子有所異同，措辭與顧氏寧人、閻氏百詩相似，未敢有所譏刺，固承朱學之家法也。其異於顧、閻諸君，則於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而口談之謬，乃至此極，害義傷教，豈淺鮮哉！或謂言出於口而無蹤，其身既歿，書又無大抵牾，何爲必欲摘之以傷厚道？不知誦戴遺書而興起者尚未有人，聽戴口說而加厲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歛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爲通人，而誹聖排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⁵⁴

其醜詆戴氏爲人，可謂極矣。論者或謂章實齋「斥東原排朱子爲飲水忘源，而並無一語及東原背師」⁵⁵，竊以爲此亦有說。按章實齋雖以史學名家，未嘗以博洽稱於時，雖於文中排擊戴氏，據錢賓四先生考證，實未見戴氏《孟子字義疏證》⁵⁶。且戴氏歿後，雖有孔刻本《戴氏遺書》，然求之通邑大都，亦非易易⁵⁷。而戴震稱江永曰「吾郡老儒」，僅見於《聲韻考》與《六書

54 《書朱陸篇後》，附載《文史通義》，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12月，頁57-59。又同書「補遺續」所收《答邵二雲書》（頁368-370）亦有攻戴之言。

55 《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頁48；《論戴震與章學誠》，頁169。

56 參《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334、383、388。

57 按郝懿行（1757-1825）《曝書堂文集》卷二《與鄧相舉孝廉書》云：「前承屬購《戴氏遺書》，都下萬難尋覓，近情人向曲阜孔氏代致，早晚或當有以報命。」（清光緒十年[1884]東路廳署刊《郝氏遺書》本）

音均表·序》⁵⁸，文字聲韻，固非章實齋所素習，則戴震稱江永曰「吾郡老儒」，實齋或不得而知之矣。然若以章實齋不言戴震背師證江戴師生之說後起，則惑矣。

僕平生服膺段、王之學。若東原戴氏者，則段、王之學所從出。方當馨香敬禮之，而必詳辨戴氏師承者，欲還歷史真實而已。博雅君子，幸垂教焉。

1988年夏初稿

58 按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於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下云：「是年，先生所著《聲韻考》四卷已成，同志傳寫。凡韻書之源流得失，古音之由漸明備，皆彙括於此。玉裁刻諸蜀中。癸巳(1773)以後，先生又取玉裁《音均表》之說『支、佳一部，脂、微、齊、皆、灰一部，之、咍一部，漢人猶未嘗通用，畫然為三』補入《論古音》卷內。李大令文藻刻諸廣東，孔戶部繼涵又刻諸曲阜。二刻與前刻詳略不同。」(《戴震集》附錄，頁467)是知今所見戴震《聲韻考》，乃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以後之增訂本也。卷三論古音，於「吾郡老儒江慎修永」云云之後接「余友金壇段若膺玉裁」云云。(《安徽叢書》影印曲阜孔氏微波榭本，卷三，頁三下、四上)段玉裁對戴震執弟子禮，此稱「余友」，以例戴震早歲師事江永，而江永於《古韻標準·例言》則稱與「同志戴震」商定古韻者，亦長者謙詞耳。戴震於癸巳始入四庫館充纂修官，竊疑《聲韻考》中「吾郡老儒江慎修永」(按李文藻刻《貸園叢書》本作「吾鄉老儒江慎修永」[卷三，頁三下])之語，乃癸巳以後所改。至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作《六書音均表·序》，於江永則仍稱「吾郡老儒江慎修永」，於段玉裁則改稱「段君若膺」而已。(《安徽叢書》本《戴東原集》，卷十，頁九下)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Tai Chen 戴震 ever formally studied under Chiang Yung 江永

(A Summary)

Chan Shing-cheong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there were several scholars, including Wei Yüan 魏源 (1794-1857) and Wang Kuo-wei 王國維 (1877-1927), who criticized Tai Chen 戴震 (1724-1777) for referring to his former teacher, Chiang Yung 江永 (1681-1762), as "an old educated man from the same county as myself" (吾郡老儒) rather than by more respectful terms. Both Wei and Wang used this "denial of his teacher" (背師) on Tai's part as evidence of his lack of moral rectitude and went on to argue that one should not be too surprised by the fact that Tai Chen, in spite of being a great scholar in his own right, deliberately plagiarized Chao I-ch'ing's 趙一清 work on the *Shui-ching chu* 水經注, (a matter over which Hu Shih 胡適 wrote a very famous defence, namely, "A Note on Ch'üan Tsu-wang, Chao I-ch'ing, and Tai Chen", in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p.970-982). However, there were other scholars like Hsü Ch'eng-yao 許承堯 in 1937, and more recently, Professor Yü Ying-shih 余英時 in 1974 who tried to defend Tai Chen on the issue of his showing scant respect for his former teacher by arguing that he never formally studied under Chiang Yung.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show that the arguments put forward by Hsü and Yü do not rest on a sound basis and are therefore not convincing and may even, at times, serve to mislead. Both Hsü and Yü did not even mention "The Epitaph on Mr. Chiang Shen-hsiu 江慎修先生墓志銘", written by Wang Ch'ang 王昶 (1725-1806) in 1776 or 1777 upon the request of Tai Chen himself. In this epitaph Wang stated unambiguously that Tai studied under Chiang Yung. Hsü and Yü also argued that Tai Chen first met Chiang Yung in 1750, but there is evidence to be found in the *K'ao-kung chi t'u* 考工記圖 which shows that Tai Chen must have met Chiang Yung before 1746. It was probable that Tai Chen first met Chiang Yung in as early as 1742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Ch'eng Hsün 程恂 and subsequently became a pupil of Chiang's.

Traditionally for a Chinese scholar not to honour his teacher was a serious matter. In this connection, it would seem that Ch'ien Ta-hsin 錢大昕 (1728-1804) had, in a subtle and tortuous manner, criticized his friend Tai Chen for precisely on account of such a lapse.